

清朝乾隆年间开始，云南每年运铜至京，所经陆路2200余里，水路8200余里

关山万里 滇铜京运

刘鸿燕

今年1月，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、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《云南省“十四五”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》，制定了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“十四五”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，在加强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中，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滇铜京运等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保护，扎实推进集中连片保护发展试点示范工作。

滇铜京运，史称“南铜北运”，始于清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终于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前后历时185年，是关系清王朝财政金融兴衰成败的要政、大政。每年云南各府、州、县铜厂，完成额定的总计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斤（633.144万斤）京铜，经由各地铜店集中，转运至东川铜店（东店）和寻甸铜店（寻店），途经云南、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，然后转入运河，经山东，渡黄河进入河北，最后由天津进入通州，直抵北京。其间，途经今天的11个省（市），贯穿大半个中国，水陆联运，跋涉万里，故称“关山万里运京铜”。滇铜京运以其运程遥远、道路艰险、运量巨大、运时漫长、动用人力物力庞大，运制完备、持续长久，影响深远，贡献巨大，创造了“今古奇观”，也在云南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璀璨的篇章。

滇铜京运的历史背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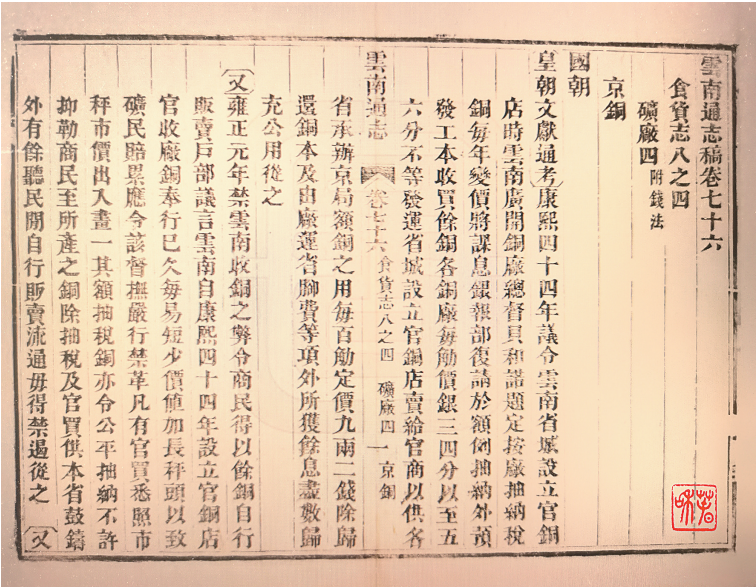
清代沿袭明制，在京城工部和户部分别设立宝源局和宝泉局，并在各省设立铸局。清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开始鼓铸“顺治通宝”铜钱。清前期的几代皇帝吸取元、明因开矿引起动乱的教训，一般都严厉禁止开矿。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迅猛发展，人口的迅速增加，货币需求量随之剧增。因此，解决日益剧增的铸币所需的铜料，成为关系财政金融稳定而亟待解决的大事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海禁开放，中国铸币用铜就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。但好景不长，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年），日本德川幕府开始实行“锁国”政策，严禁船只出国，包括铜矿在内的各种矿产资源也严禁出口，清政府铸钱所需之铜只得转而依赖国内矿山。

云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，其中铜矿储量丰富，“滇多矿而铜为巨擘”（吴其浚《滇南矿厂图略》），开采历史尤为久远，早在3200年前的商代晚期就已进行开采和冶炼，至明嘉靖年间所铸“嘉靖通宝”钱币则宣告滇铜铸币历史的开始。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，云贵总督蔡毓荣上奏《筹滇十疏》，提出以滇铜之丰饶，应“鼓铸宜广也”“矿硎宜开也”的理财之策，建议大力增设铜厂，广泛开采铜矿，得到朝廷采纳。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，朝廷在昆明设立官营铜店，为各省采购京铜创造了条件，初步形成了云南铜矿业采、烘、购一条龙的体系。

与此同时，从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到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，长达31年在东川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，极大地推动了东川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，东川铜矿业进一步兴旺发展。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，东川由四川划归云南，同时增开汤丹等厂，铜厂大旺。一向注重矿山建设与开采的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朝廷：滇省增开汤丹等厂以来，铜产量大幅增加，除了本省使用，每年有余铜200多万斤，官方无力采买，建议朝廷动用盐税余款收购，再



会泽县文管所收藏的宝云铸钱局铜锭



道光《云南通志稿·卷七十六·食货志八之四·矿厂四·京铜》（局部）



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
会泽县文联提供



会泽白雾村滇铜京运路线示意图 刘鸿燕 摄

“转运至江南等省，令收买还项”，这一奏疏得到朝廷批准：“将滇省余铜，令该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，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，以备湖北、湖南采办之用；以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，以备江苏采办之用。”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东川所产之铜外运汉口、镇江，然后转运北京，标志着滇铜京运正式开始。

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，朝廷全面停止采办日本洋铜，更大规模的滇铜京运随即拉开序幕。

滇铜京运的路线

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，清廷最终额定了云南每年运出京铜数量为633.144万斤，分别运往寻甸、东川两个铜店，出境后转运北京，“自滇至京，长途万里”。滇铜京运的全过程，包括分运、递运和长运三个阶段。分运是指从各生产厂运送到收购和储存铜料的地点即铜店，递运是从各铜店依次运到四川泸州铜店的运程，长运是从泸州沿长江航道再转运内河水道而达北京的过程。

云南负责京运铜的铜店为东川铜店和寻甸铜店。东川府所辖汤丹厂、大水沟厂、碌碌厂等铜厂，将京运铜由各

厂经林家渡（今板河口下游）渡过江，再经新厂、小江口、尖山沟、坪坪子、焦家坝、大村子、热水塘，渡以礼河进入东川铜店，或再由东川经待补、大水塘、功山至寻甸铜店。由东川铜店和寻甸铜店，分两条路线运往四川泸州铜店（泸店）。寻甸铜店路线：由寻甸取道宣威，经威宁、镇雄到泸州；东川铜店路线：大水沟厂、碌碌厂等铜厂的铜料沿播卡梁子运至小江口象鼻岭。

鉴于陆运成本较高，为节省运铜成本，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，云贵总督张允随报请修浚金沙江为运铜水道，同时修整陆路。次年，水运开始。然而，金沙江滩险流急，巨石暗礁无数，运铜船只时有触礁沉船事故发生，铜料损失巨大，遂于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停运。而后采取分段通航的方法进行水运，持续一段长时间后，核算成本仍比陆运成本还高，于是，铜运上半程又改为陆路为主。

铜运改程后，铜料仍在象鼻岭集结，由马帮驮装，过小江，沿大湾子爬高家坪经云峰进挪姑达白雾，再由白雾至东川府城（今会泽县城）。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，巧家富绅刘汉鼎捐资修筑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，古道

起自小江口，终点为东川府城（今会泽县城）。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道成，“较旧近二十余里”，此后，铜运马帮和民间往来均改行此道。京铜运至东川府城（今会泽县城）办理通关文牒后，即由会泽北上昭通，经大妥、盐津沙关直达泸州总店。至今，会泽县娜姑境内仍留存有两段保存完好的铜运古道，一段为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，另一段为云峰铜运古道，均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滇铜运到泸州后，陆运基本结束，开始水运。运铜船队从泸州起航，至扬州仪征市大运河河口起股，大船满载京铜扬帆北上，在通州上岸，到京城户部和工部交货。至此，一次完整的滇铜京运始告完成。通常情况下，东川府每年运铜4次，从泸州至北京水运路段，每次有8支船队，每支船队13艘大船，每艘大船运铜6万余斤。陆运则需马匹9000余匹次。每起京运的期限，大约为一年，交铜后，从京城返回云南的时间限定为99天，延误或超期都将受到相应的严厉处罚。据《云南铜政考》一书统计，滇铜京运陆路2200余里，水路8200余里，全长万里之上。

要与民间验辛苦

欧阳锡龙

看。”“青苗收捐易，黄土葬人难。”他到达曲靖时，当地正处秋涝，田野如同汪洋，不少民房被毁。宋湘心急如焚，立即组织抢险救灾，号召民众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水患旋即得到治理，受灾百姓妥善安置。

宋湘经常走访民情，访贫问苦，马龙州地瘠民贫经济萧条，百姓仅靠农业谋生。他悉心策划，带头捐薪购买棉籽，安排专人指导当地乡民种棉花，并立即筹集资金购买纺车500台，无偿分发给百姓，让妻子教他们纺纱织布。通过种棉、织布，马龙乡民收入提高，生活得到改善，并带动相关手工业发展。马龙百姓深记宋湘政绩和厚德，把所织之布称为“宋公布”。

广南府百姓用水困难，宋湘捐款并亲自勘测水源，开凿东、西两塘引水至城，供百姓饮用。在大理代迤西道尹时，饥荒瘟疫并行，他又捐俸抚恤百姓组织自救，自购松籽3石指导百姓植树造林。宋湘在大理手撰“种松诗碑”，其中就有“一粒丹砂一鼎封，一枚松子一株松。何时再买三千石，遍种云中十九峰”的诗句。在永昌府时，他捐俸银170两修复书院，每年培养学子数百人。

“诗人自有诗家法，得失千秋一片心。”作为书生官员，宋湘绝不向地方黑恶势力妥协。史载，保山县湾甸土州的美景在东桥奢横行，鱼肉乡民，长达五六十年，但当地知县胆怯不敢上报。宋湘出



宋湘画像及其行书对联

钱出粮招募训练乡勇，没有花费公家一分钱，最后斩敌首、安边陲。当地百姓感恩戴德，“建生祠祀之”。

以诗言志 廉洁自律

“忘年十载此长安，阅尽荣华耐尽寒。我是何人须是我，真诗莫与外人看。”不论为官还是作诗，宋湘用的都是真心，始终保持着“要与民间验辛苦”的初心。在南行赴任途中，宋湘坐的官船引

得百姓好奇围观。这让他愧怍不安：“官船过处人环目，老妇幼儿排簇簇。直教看杀老东坡，彼自殷勤我感惑。……我今前去滇南守，如是豺狼是父母？马无情呼不来，车乘翘翘畏我友。”他也自省自责：去云南赴任，不应该像豺狼那样，而应该像父母清官那样，对得起百姓和自己的良心。

宋湘以诗言志，廉洁自律，从来不玩虚的。在走访百姓村时，他发现情况人家的牲口糟蹋乡村树不用赔，情势愈演愈烈。宋湘要求各村制定村规民约，无论何人放牧，如果损坏庄稼必须赔偿。他自己身体力行，有一次他和随从送妻子到马龙教授织布，不留神马吃了几十簇秧苗。宋湘马上叫随从把所损秧苗总数按成熟稻谷计价赔偿。此事很快传遍曲靖各县，此后随意放牧糟蹋庄稼的事就很少发生。

见贤思齐 注重学习

《清史稿》《广东通志》《嘉应州志》均记载，宋湘一生俭朴，把薪俸大部分捐给地方公益事业，他自己却从未给家乡旧居增一砖一瓦，未给子孙谋一官一田。

宋湘为官清廉，勤政亲民，体恤民间疾苦。这一作风，与宋湘自幼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影响很有关系。青少年时期，他得益于多位名师的启发引导，长期熏陶于儒家学说，潜移默化间

滇铜京运的贡献

滇铜京运为国家财政金融作出了巨大贡献，云南也因此具有了全国性的战略地位，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清代东川乃至云南全省，铜矿生产占据了全国十分重要的位置，仅以乾隆、嘉庆时期来看，“云南作为全国的铜原料供应地，铜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5%”。滇铜京运保证了清廷铸币所需大量原料——铜料的供应，为支撑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固提供了有力保障，作出重大贡献。《清高宗实录》载：云贵总督殷必达奏称：“其汤丹、大碌等各厂二十四五两年，办铜二千六百余万两，共得课息银五十余万两。”随着滇铜京运的进行，清政府每年向东川府所征税银由300余两增加为50余万两甚至到乾隆中期的100万两，其增长之迅猛，对国家财政贡献之大，可见一斑。

滇铜京运的影响

滇铜京运对云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滇铜京运将云南与中央乃至全国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云南在为稳固和促进清王朝财政金融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，云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也得以飞速发展，出现了“远人鹜利纷沓至，运贾芟茅安井臼。顿令空谷成市廛，铃驮驛车毂走”的空前繁盛景象。

政治影响。由滇铜京运带动形成的农矿并举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，催生了一些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，尤以享有“万里京运第一城”美誉的东川府（今会泽县）为显著。因矿业兴旺和滇铜京运，推动了东川府由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，转变为农矿并举的经济模式，经济社会长足发展。

经济影响。滇铜京运直接促进了云南地区采铜、冶炼、鼓铸、加工等铜矿业的迅猛发展，进而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城镇的繁荣鼎盛。仅以东川府来看，年平均铜产量达800-900万斤，最高产量为1400万斤。从铜厂人数来看，汤丹厂“厂民曾达10多万人”。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高度聚集，使得矿区成为一个需要大量聚集粮食、燃料、生产和生活物资的区域。铜矿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、交通运输业等多个产业的联动发展，从而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城镇的繁荣。

文化影响。滇铜京运带来云南铜矿业的迅猛发展，引发了清代的移民浪潮，陕西、甘肃、安徽、江西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广等10余个省份的富商大贾、贩夫走卒、矿工、工匠、民夫、文武官员云集于云南。云贵总督张允随曾于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和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先后奏称：“外省游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数十万，皆赖开矿走厂度日”；“滇省……惟地产五金，不但滇民以为生计，即江、广、黔各省民人，亦多来滇求产”。滇铜京运带来多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，构建起了云南多元和谐的文化格局。如今，素有“万里京运第一站”之誉的会泽白雾村尚存的会馆、文庙、清代四合院以及四合五天井、走马转角楼、三坊一照壁等諸多建筑样式，就是滇铜京运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、交融、和谐共存的历史见证。

（作者单位：云南省社科院历史、文献研究所）

云南故事

明代马龙象战

杨增外 文/图



马龙街头由云南艺术学院教授邵川设计制作的《忠勇义象》浮雕

明代天启年间，马龙州（今曲靖市马龙区）发生了大家参加平定地方战乱

的壮举，可算一桩旷世奇闻。万历年间，奢安之乱横扫川黔，西南大地狼烟四起。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三月，土司安效良纠集水西、古蔺两股地方势力再掀战乱。五月，水西土酋军队数万人抵沾益、占曲靖，抢掠民众财物，一路烧杀到马龙。

面对严峻的战乱形势，时任云南巡抚闵洪学一面表奏朝廷，一面令布政使谢存仁、副总兵袁善、参将尹易及本地土司等，率兵数万抵达马龙平定战乱。

初战，水西军人数众多，明军势单力薄，局势危急。在此关键时刻，景东傣族陶氏知府受命率精兵千人及训练有素的7头战象，日夜兼程赶到马龙，支援平定战乱。两军会师后，陶土司按照7头战象各自的体形，分别给它们披上铠甲，又在战象的两根长牙前端的捆绑锋利的剑刃，剑刃能随象牙左右自如挥动。7头战象聚在一起，像一座环立的小山，阔步向前如土山滚动。

战斗开始，陶土司指挥气宇轩昂的大象走在各路军队的前面，迎战汹汹而来的水西军。象队作前锋，加之陶土司的上千精兵参战，明军士气大振。

双方在马龙南面的松子山至北面的轿子山一带约8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激烈厮杀。据《滇游记》及《滇黔游记》等史载：战斗开始时，大象按照周密制定的突袭策略，白天潜伏山洞，日暮月黑风高，7头大象以鼻吸泥土数斛，突然发起攻击，咆哮跳跃，直抵水西军战至鼻喷泥水，并卷一人掷空坠死，其他人不知有如天降的是何庞然大物，因此惧怕而自相践踏。战象乘势分队奋勇向前，挺起矛一样的长牙，配合着利刃，威风凛凛冲向水西军阵地，真有撼山崩地、摧枯拉朽、所向无敌之势。水西军中有的被象鼻卷起抛向空中，有的被尖利的象牙和绑着的剑刃刺穿，有的被圆柱似的象腿踢翻、踩踏……

明军鼓角齐鸣，乘势冲锋，喊杀声震天动地，水西军慌不择路，溃不成军。此时，安效良咬牙切齿，下令放射毒箭。一头冲在最前面的战象中箭，剧烈疼痛使它怒性奔发，在阵中横冲直撞，巨身所至，势不可挡……

经过五天的激烈厮杀，明军在轿子山的南面打败了进入马龙的水西军，全胜收场。再看这7头战象，其中一头战象，身上所中毒箭密密麻麻，取下的毒箭有一箩筐，射入皮肉的毒液渗进了大象体内，这头大象坚持了三天不幸毒发而亡。另6头大象，虽也不同程度的中箭，但总算幸免于难。

马龙主政者告知全州各界，择黄道吉日，把阵亡的这头战象隆重下葬在马龙州城北面，令石匠刻石立碑，传诵其功。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，墓碑落成，碑正中题写“义勇全城忠烈神象之家”，两侧碑文铭刻了战象的不朽功绩。

明代马龙人杜其渐，写了《义象传》，说这头身中数箭，仍称“著名陷阵，死无二志”的大象，就是著名勇士孟贲、夏育也会“遇之其畏胆”，“熊虎当也亡其亡德”。“论其威，则项羽之破章邯也；论其烈，则赵云之战汉水也；论其功，则信陵之救邯郸也；论其死，则张巡之睢阳也。”杜其渐认为这头大象是正义的化身，其功绩足以流芳百世。

明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，到云南任巡抚的王伉途经马龙，专程到义象墓地凭吊，感慨不已写下四首绝句，称赞“分明物亦凛王征，一代关河死节争”，命令在象家前建造牌坊，匾额题写“忠勇义象之坊”。进入清代，还有不少人前往拜谒义象墓，写下了《义象歌》《象冢铭》《马龙州义象墓》等诗文。

如今，明末建成的义象冢及牌坊已经不存，但忠勇义象的故事和精神，仍在马龙大地传颂。

（作者单位：马龙区委农办、农业农村局）

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

云南古代清官廉吏

清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曲靖知府宋湘离开云南时，送行群众夹道十里。在他任职过的地方，百姓自发筹钱为他建祠立碑。光绪《云南通志》言其“历官皆著治绩，而罢被后进，成就尤多，士林传其遗事，以为美谈。”《广南府志》评述他“公正廉明，政先教养。”

宋湘（1757-1827年），字焕襄，号芷湾，今广东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人。嘉庆进士，官至湖北督粮道。宋湘诗、书、画皆精，有“广东第一才子”之誉。

忧民爱民 担当务实

嘉庆八年（1813年），58岁的宋湘以翰林身份被外放出任云南曲靖知府，先后担任曲靖、广南、大理、永昌、楚雄等地知府及迤西、迤南道尹等职，在云南任职长达13年。

宋湘上任曲靖知府当年，恰逢豫、冀、鲁、鄂等地大旱。途经河南，宋湘看见沿途灾民流离失所，境遇悲惨，忧心如焚慨然长叹：“十日河南路，年荒不忍